

八家後漢書輯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周天游
輯注

八家後漢書輯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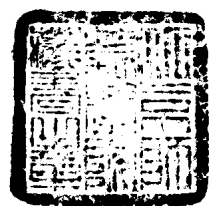
（上）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98257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1098257

周天游
輯注

八家後漢書輯注
(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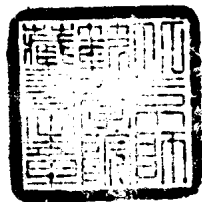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98261

1098261



八家後漢書輯注

(全二冊)

周天游 輯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祝橋新華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30.125 插頁 4 字數 579,000

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8000

統一書號：11186·88 定價：7.30 元

前言
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羣雄競立，紛爭不已。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權更迭，却引來了史學的勃興。爲替一時當道的統治者提供治世的鏡鑑，謀求正統的地位；爲給播越的門閥士族炫耀高貴的門第，追憶逝去的榮華，私家修史，一時蔚爲風尚。其中在東觀漢記的基礎上而撰寫的後漢書，今可知者竟達十二家之多。除晉袁宏後漢紀和劉宋范曄後漢書流傳至今外，尚有吳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、晉薛瑩後漢記一百卷、晉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（八志凡三十卷附范曄書以傳）、晉華嶠後漢書九十七卷、晉謝沈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、晉張瑩後漢南記五十五卷、晉袁山松後漢書一百卷、時代未詳的劉義慶後漢書五十八卷（二）、梁蕭子顯後漢書一百卷（以上均紀傳體）、晉張璠後漢紀三十卷（編年體）。

在上述後十部書中，劉義慶、蕭子顯二書亡于隋或唐初。不僅唐劉知幾在史通中已無片言隻字論及，甚而殘文賸字，也無從考見，故今且擱置不論。其餘八書，一則遭西晉永嘉之亂等各次兵火之

劫，多有損佚。唐初雖略有復出，終難成完帙。再則遇唐章懷太子李賢爲范曄書作注，使之盛行于世。如六臣注文選，其引用范書已占十之七八，而諸家殘書遂不復爲世人所重。以至宋太宗淳化年間，在吳淑進注事類賦裏，謝承書、張璠紀、續漢書已均淪入遺逸書之列。而宋仁宗景祐元年，徐靖奉詔校正後漢書，敍其原委，僅臚列謝承、薛瑩、司馬彪、華嶠、謝沈、袁山松諸書卷帙之多寡，竟不能取證參稽，以定異同。總之，八家書至遲于兩宋之際，已如逝水飄風，遺而不存，是確然無疑的事實（三）。所幸的是，我們今天仍能從後漢書注、續漢志注、三國志注、世說新語注、文選注等等文史之注中，以及北堂書鈔、藝文類聚、初學記、太平御覽種種類書中，略窺其斑豹，以爲研史之助。

范曄後漢書集衆家之長，博大精深，後來居上，歷久不衰，確乎爲治東漢史者之圭臬。然而八家後漢書佚文，亦不可廢置。清康熙中姚之駟纂輯後漢書補逸時曾說道：「夫他書可逸，惟史當補。近史文煩或可逸，古史文約尤當補。今試以謝、華諸史與范校，其闕者半，其同者半。其闕者可以傳一朝之文獻，其同者且可以參其是非，校其優絀，于史學庶乎其小補也。」姚氏既不誇大其作用，又不無視其存在，如此對待八家書佚文，可謂允當。

然而八家書參差不齊，自有優劣之分，應該視其質量高下，佚文多寡，區別對待，各盡其用。

梁劉勰于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曰：「至于後漢紀傳，發源東觀。袁、張所制，偏駁不倫；薛、謝之作，疏謬少信；若司馬彪之詳實，華嶠之準當，則其冠也。」又劉知幾于史通古今正史篇中，在簡要敍

述了東觀漢記的撰述經過後，于八家書中僅僅介紹了司馬彪、華嶠二書，并說後漢書「作者相繼，爲編年者四族，創紀傳者五家，推其所長，華氏居最」。可見自南北朝至唐初，推崇華、彪二書，是一時的公論。

華嶠字叔駿，西晉平原高唐（今山東禹城西南）人。歷事武、惠二帝，「博聞多識，屬書典實，有良史之志」〔三〕。因而長期主持朝廷的撰述之事。華嶠不滿意東觀漢記的蕪雜，有意改作。自爲臺郎後，得以遍覽宮省秘籍，于是整理史料，排比考校，上起光武，下迄孝獻，述東漢一百九十五年歷史，以爲漢後書。惜十典未成而嶠卒，復經其子華徹、華暢相繼董理，始成完書。此作一經問世，即得到一致推重。中書監荀勗、令狐、太常張華、侍中王濟都認爲華書「文質事核，有遷、固之規，實錄之風」〔四〕。遂藏之秘府，與史記、漢書、東觀漢記并行于天下。

范曄對華書十分欣賞，在撰作後漢書時，除取材東觀漢記外，漢後書成爲其主要的藍本。以體例而論，華嶠以爲「皇后配天作合，前史作外戚傳，以繼末編，非其義也，故易爲皇后紀，以次帝紀」〔五〕。而范曄亦沿用其例，遵而不改。又華嶠行文「言辭簡質，敍致溫雅」〔六〕，其論尤爲精絕，所以范曄往往全部或部份襲用之。今可考者，有李賢注所言之肅宗章帝紀論、馬武傳論、馮衍傳論、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傳序、班彪傳論、袁安傳論。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所言之王允傳論。閱袁宏紀所知之丁鴻傳論、皇甫嵩傳論、襄楷傳論。而尙未注明的恐怕還有若干。姚之駟以爲范書「微章懷

注之，則掠美者勝矣」〔七〕，雖不免有些言過其實。但他指出「蔚宗其亦服膺斯編」〔八〕，却是一語中的。可以這樣說，范曄的成功，也包含有華嶠的許多心血在內。

從現存的華嶠書佚文中，我們不但可以明瞭華書與范書的內在聯繫，而且對范書的材料亦小有補益。如馮衍的祖父，范書和東觀漢記均作馮野王，唯華書作馮立，可聊備參考。又范書節略諸書，常有失之過簡之弊。如陳愍王寵善射，范書僅作「寵善弩射，十發十中，中皆同處」，使人難以領略其奧妙。而華書則曰：「其祕法以天覆地載，參連爲奇。又三微三小，三微爲經，三小爲緯，經緯相將，萬勝之方，然要在機牙。其射至十發十中，皆同孔也。」讀來令人豁然而悟。

司馬彪字紹統，高陽王睦之長子。因好色薄行，廢而不得爲嗣。于是司馬彪不交人事，專精學問，博覽衆籍，撰述甚豐。除續漢書外，他尙注莊子，作九州春秋，又據汲冢紀年，條譙周古史考之誤凡百二十二事，而名噪當世。姚之駟言：「向使彪嗣高陽王，懷桐披袞，不過貴耀一時，豈能使千百年下傳其著作若此哉！」〔九〕司馬彪雖經挫折，却能翻然醒悟，因禍得福。事在人爲，其性格品行確有過人之處。

司馬彪八志「雖未盡善，而大較多實」〔一〇〕，至今仍爲研討秦漢典章制度的重要依據。所以與其說是彪志依范書而得以傳世，不如說范書憑彪志而近于完備。但是司馬彪未著藝文志，使一代典籍不能俱陳于史冊，以供後人索驥，令人深感遺憾。不過續漢書紀傳的佚文，數量之可觀，僅次于謝承

書。不但能印證范書之言而有徵，且可以較多訂補范書的不足。如和帝葬于順陵，證之以袁宏紀，足以明范書作「愼陵」之誤。通鑑即舍范書而從彪書、袁紀。再如張角心腹馬元義之死，續漢書作「爲山陽所捕得，鎖送京師，車裂于市」，可補范書之闕。

然而入清以來，謝承書聲譽日隆，竟一躍而爲八家書之首。如姚之駟即曰：「謝偉平之書，東漢第一良史也。」^{〔二〕}王謨亦曰：「余於諸別史中最愛謝偉平後漢書，記載賅博，遠勝范蔚宗。」^{〔三〕}這就不能不使人要探究其根由了。

謝承字偉平，會稽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吳主孫權謝夫人之弟。曾拜五官郎中，稍遷長沙東部都尉、武陵太守。謝承書是繼東觀漢記之後的第一部私撰後漢書。僅據殘圭斷壁，已可知其著述頗具特色。就體例而論，隋書經籍志言其無帝紀。但是史通自敘篇曰：「始在總角，讀班、謝兩漢，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，後書宜爲更始立紀。」既然更始尙且要補立本紀，謝書豈能無帝紀？倘若謝書無帝紀，劉知幾又豈能默然不置一辭？可見隋志所言，乃指謝書帝紀于隋初曾散佚罷了。謝書不僅紀、志、傳俱全，而且又有所創新。如關史通可知，謝書有輿服、百官二志。前者源于東觀漢記之車服志，後者則出自漢書百官公卿表，然皆別立新目，并爲續漢書所做效。另據明陳禹謨本書鈔，知謝書又有兵志及風教傳，爲當時史書所僅見。此二目雖不能遽作定論^{〔四〕}，然而從謝書佚文推斷，范書傳目中之東夷列傳，毫無疑義本之于謝書^{〔五〕}。而獨行、方術、逸民、列女諸傳也可能仿謝書而

設，并非范曄所獨創〔二五〕。

此外，就內容而言，謝承于「忠義隱逸，蒐羅最備，不以名位爲限」〔二六〕，所以「姜詩、趙壹身止計吏，而謝書有傳」〔二七〕。因而嚴元照認爲「其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者，蔚宗不及也」〔二八〕。在這些忠義名卿通賢逸士中，尤以江南人物居多。而范書只列「南州高氏父子及陳重、雷義、程曾、唐檀數傳，其何湯僅附見桓榮傳」。章懷太子注引謝書載湯事，亦綦詳。外有羊茂、孔恂、嚴豐、宋度、湛重、鄧通、項誦、劉陵、黃向、張冀十人爵里事迹，班班可考，乃其姓名，俱不掛范書〔二九〕。對此王謨不禁爲之憤憤然，甚至指責劉知幾關於謝承「周悉江左」，「偏黨吳越」之議，爲「亦淺之乎測偉平矣」〔三〇〕。再則，謝書佚文數量之多，幾占八家書佚文總數之半，而謝書佚文又半爲范書所失載，這樣就大大豐富了東漢史料寶藏。出于上述原因，清代學者推崇謝書，也就不足爲怪。

但是，平心而論，謝書佚文之所以這樣多，重要的原因正是「謝書尤悉江左，京洛事缺于三吳」之故〔三一〕。除去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記述之外，「若其他事迹，與范書異者，亦未見定勝」〔三二〕。因此，就全書總價值而言，謝書實不及范書。范曄出于全盤的考慮，對謝書大加刪節，略有所取，無可厚非。而正由于范書失載，才使這批頗具地方特色的名士譜，被唐、宋類書從宣揚名教氣節和保存軼聞逸事的角度出發，意外地保留了下來。而在東漢史料較爲缺乏的情況下，這批佚文自然顯得特別寶貴，尤其對探討漢代的社會風俗和精神風貌來說，更不可不讀。

至于薛瑩、謝沈、張瑩、袁山松、張璠五書，無論從寫作質量上說，還是從佚文數量和史料價值上說，均不能望上述三書之項背。

袁山松，陳郡陽夏（今河南太康）人。東晉時爲吳郡太守，因拒孫恩而死于滬濱。袁山松乃袁宏的從弟，先後同時，一著後漢書，一作後漢紀，不失爲史林一段佳話。然而袁紀存而袁書亡，二者之優劣，于此大略可知。但是袁山松書中，志書較全，其中郡國志、祭祀志、五行志佚文，對續志多有訂補。藝文志更爲其書所獨有，惜已全佚。而其他佚文，也時有可取。如明帝字子麗，應奉刪史記、漢書、漢記爲漢事，以及王充論衡由蔡邕傳入中土的經過，微袁書幾泯滅不爲人知。

張璠，晉之令史，曾出爲長吏，而具體事迹則無考。其所著後漢紀似未完之作，且流傳不廣，散亡亦早，所以余靖表中竟未能提及。四庫館臣曾將其佚文與袁宏紀有關記載相比較，以爲都是袁紀爲佳。不過袁宏也承認，張璠紀「言漢末之事差詳」^{〔三〕}，所以曾汲取其部份成果，使袁紀關於漢末的記述更加完備，甚至比范書還要詳實。因而張璠對史學還是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的。

在八家書中，薛瑩、謝沈、張瑩三書的佚文最少。薛瑩字道言，沛郡竹邑（今安徽宿縣北）人。初爲吳祕府中書郎。孫皓在位時，又任左國史，參預修撰吳書。後降于晉，官至散騎常侍。史稱其「涉學既博，文章尤妙」^{〔四〕}。後漢記是他的私撰之作。謝沈字行思，一作靜思，會稽山陰人。晉康帝時，曾任著作郎，撰晉書三十餘卷。其所撰後漢書本一百卷，又錄二卷，後漢書外傳二十卷，所以隋

志舊注作一百二十二卷。張瑩曾任江州從事，晉書無傳，籍貫及生平事迹均無考。薛書所存主要是光武、明、章、安、桓、靈六帝紀之論。其褒貶抑揚，發自胸臆，直道而陳，切中要害。如他在肯定劉秀的中興偉業後，又曰：「古者師不內御，而光武命將，皆授以方略，使奉圖而進，其有違失，無不折傷，意豈文史之過乎？不然，雖聖人其猶病諸？」難怪姚之駟贊曰：「末段如神龍掉尾，使人不可捉摸，更佳。」范論但敘光武符瑞，不及開創大略，失史體矣。」書而謝沈書則是禮儀、祭祀、天文、五行、郡國五志佚文，對續漢志略有補益。至于張瑩記佚文，却與范書多同，唯安帝見銅人條爲其所獨載。

八家書沈淪千載，然其佚文，自唐以來，學者文人于考史著文中，仍屢有徵引。至清代，樸學興起，輯佚之風大盛。自姚之駟首開重輯諸家後漢書之端，于是孫志祖、王謨、章宗源、黃奭、汪文臺、王仁俊諸人接踵而起，或訂補，或重輯，或潛心于一書一志之發掘，或致力於竭澤而取，輯本疊出，蔚爲大觀。

姚之駟字魯斯，錢唐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康熙辛丑進士，官至監察御史。其輯本名曰後漢書補逸（筆者用康熙中栢筠書屋刊本，又參之以蔡元培校徐友蘭鈔本，均藏北京圖書館）。所輯書以其目錄爲序，凡東觀漢記八卷，謝承書四卷，薛瑩、張璠、華嶠、謝沈、袁山松諸書各一卷，續漢書四卷。總計八種二十一卷。使已湮之籍，一旦哀然傳世，其筆路藍縷之功不可沒。但是此書缺點甚多，傳世後屢遭抨擊。概括起來，首先是姚氏藏書寂寥，并鮮獮祭之功，連太平御覽都未曾取資，故闕漏甚多。

其所用書鈔又是明陳禹謨本，文多妄增誤改，遺害後學。而姚氏又頗沿明儒舊習，讀書不精，考辨乏力。以至誤認續漢志爲范曄所作，竟又從類書和史注中別輯志文，勞而無功，徒增笑柄。此外，如其不詳謝承任武陵太守的出處，可見姚氏未曾讀過吳志謝夫人傳，也未曾認真讀過隋書經籍志舊注。而其不識「承父嬰」即指謝承之父謝嬰（一作嬰），甚至曰：「范書有承宮，續漢書載宮子名疊，無承父嬰。」世本承姓，衛大夫承叔乘之後。抑或承父複姓，嬰其名與？」三云讀來令人啼笑皆非。再則姚輯文皆不著出處，使人無從考索。且編目漫無條理，隨手簽記，顛倒錯訛，觸目可見。如誤陳政爲陳正叔，分宋度爲宋度、宋叔平二人。然而當時正處輯佚草創階段，手段不高明，在所難免。何況姚之駟并不以此作妄自矜誇，自謂「雖殘缺失序，聊以見其大凡」，「尙俟博雅君子補其闕」三。其良苦用心，猶堪敬佩。

爲了訂補姚輯的不足，更出于對謝承書的推崇，于是孫志祖的謝氏後漢書補佚問世（筆者用民國二十年南京龍蟠里國學圖書館石印本）。孫志祖字頤谷，一作詒穀三，乾隆間仁和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曾官江南道監察御史。全書共五卷。前四卷仍姚輯之舊，然「凡姚氏所採者，一一著其出處，誤者正之，略者補之，復以范書參訂同異」三。而第五卷則是孫氏之續輯。其徵引精博，遠勝姚輯，雖小有疏漏，絕非一般率爾操觚徒事漁獵類書者可比。孫輯流傳甚稀，張之洞撰書目答問，也僅聞其書，未見傳本。幸由柳詒徵先生據丁氏善本書室精鈔本，于民國二十年刊印于世，才得以

流布。

與孫輯幾乎同時成書的，則是輯佚大家王謨的謝承後漢書鈔（筆者用原刻本）。王謨自署汝上老人，乃江西金溪人，字仁圃，一字汝廉，乾隆進士。其輯漢魏遺書鈔五百餘種，而刊行的僅經部一百零八種，史部之書則不爲人所知。謝承後漢書鈔六卷，一函四冊，清刻本，今藏南京圖書館。其標作漢魏遺書鈔別史之一，則史部書未嘗不刊行。本書初成，以未見姚輯而未果授梓。嘉慶年間始從坊間購得姚輯，發覺其所輯謝書人物較姚輯多百餘人，始欣然刊印。此書雖較姚輯差詳，且與孫輯可互相補益，但在徵引廣博和考辨精審上，均不逮孫輯。除謝書外，王謨于漢唐地理書鈔中（中華書局影嘉慶中金谿王氏刊本），又輯得袁山松書郡國志一卷，略有疎漏，而遠勝他輯。

乾嘉之際，祖籍浙江會稽的宛平（今北京市）舉子章宗源，于撰述隋書經籍志考證的同時，曾以極大的精力從事于漢晉遺書的輯佚工作。據孫氏祠堂書目及黃奭所輯張璠紀序所言，他輯有華嶠書和張璠紀各一卷。章氏死後，其書稿半毀于火，所餘或寄交章學誠，或存孫星衍處，或歸之于葉雲素，而華、張二書輯本却下落不明。黃奭曾有知足齋叢書問世（筆者用原刻本），印數甚罕，今藏北京圖書館，而中國叢書綜錄脫而未錄。其中輯有張璠、謝沈、華嶠、袁山松、薛瑩五書各一卷，均無序跋，無出處，略有案語。而參之以黃奭訂補姚輯而作的黃氏逸書考（筆者用民國二十三年朱長圻補刊本），時有不同。如張璠紀佚文則脫伏皇后、靈帝、班超、周舉、樊豐、侯覽、成瑨、陳寵、王堂、范滂、

荀靖、荀昱、荀曇、荀彝、朱儁、种劭、袁紹、曹操、劉表、孫堅、譙周、條支國諸目。計御覽十一條，類聚二條，文選注二條，世說注一條，三國志注六條。而梁冀、朱穆、陳球、董卓、獻帝諸目，又有脫遺。計御覽七條，續漢志注一條。又如華嶠書則脫獻帝、伏后、賈復、王梁、馬成、申屠剛、傅昌、陳寵、劉般、鄧彭、薛苞、賈逵、慶鴻、班始、劉永國、周規、張楷、胡廣、馬融、桓麟、孔嵩、蔡孟喜、王甫、曹嵩、崔寔、趙岐、崔鈞、袁牢夷、散騎、論班彪班固、孝義列傳序、補遺諸目。計御覽二十五條，書鈔六條，范書本傳注五條，文選注二條，初學記二條，袁宏紀四條。又明帝、馬援、桓榮、樂松、江革、第五倫、韋彪、宋均、耿秉、桓典、班超、趙壹、楊震、崔駰、應瑒、靈帝諸目也均有脫漏。計御覽十二條，類聚一條，書鈔三條，范書本傳注九條，文選注二條，初學記一條，水經注一條。唯劉寬目比逸書考多書鈔一條。竊以爲黃奭似親見章輯，又深知其下落。其曾言章氏「凡隋書經籍志所列目，積生平全力，以返其魂，竟十得八九，哀然大觀」〔三〕。或此知足齋叢書本即源自于章輯，亦未可知。倘若事實果真如此，則章氏輯本絕非僅張、華二書。而之所以脫漏甚多，恐與書非定稿，又復有散亡有關。章氏于隋書經籍志考證一書中，曾指明張瑩記佚文綫索十五條，除陳寵條系張璠紀之文誤入外，僅脫書鈔二條，共十三字。足見其對諸家後漢書是頗費了一番心血的。精心之作，竟湮沒無聞，良可歎惜。

黃奭字右原，甘泉（今江蘇江都）人。道光年間輯得謝承書、薛瑩記、華嶠書、謝沈書、袁山松書、張璠紀各一卷，「視姚氏差詳，終不賅備」〔三〕。初入漢學堂叢書（筆者用光緒中印本），後易名黃氏

逸書考。黃恩綸曾預其役，出力甚勤。

而諸輯中最爲精湛的當推汪文臺七家後漢書（筆者用光緒八年鎮江林氏刊本）。汪文臺字南士，安徽黟縣人。曾作論語外傳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、淮南子校語、脞稿及英吉利考略等書，阮元亦「服其精博」〔言〕。汪氏尤留意于諸家後漢書，于舊藏姚輯本上，「隨見條記，丹黃殆徧。後慮未盡，以屬弟子汪學惇，學惇續有增益」〔言〕。共收錄謝承書八卷，薛瑩書一卷，司馬彪書五卷，華嶠書二卷，謝沈書一卷，袁山松書二卷，張璠紀一卷，末時失氏名後漢書一卷，共二十一卷。所輯人物據目錄所見粗計，凡謝承書三百九十人，薛瑩書七人，司馬彪書二百七十四人，華嶠書一百二十九人，謝沈書九人，袁山松書五十五人，張璠紀五十五人，失氏名書六人，共九百二十五人。而姚輯謝承書凡二百八十一人，薛瑩書七人，司馬彪書一百九十五人，華嶠書九十人，謝沈書四人，袁山松書三十三人，張璠紀四十一人，共計六百五十一人。汪氏增益之數，約占姚輯之半。又按黃輯，凡謝承書四百一十三人，薛瑩書九人，華嶠書一百一十六人，謝沈書十二人，袁山松書五十八人，張璠紀五十九人，共有六百六十七人。此輯雖比汪輯相應書人物稍多，而除去分目不同的因素，與汪輯大致相仿，各略有增損。而黃輯未輯續漢書佚文，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。此外僅就謝承書而言，孫輯與汪輯基本相同，而王輯則脫二十餘人。總括起來，還是汪輯冠冕諸輯。而汪輯編目有序，出處周詳，考辨精當，取輯廣博，也較諸輯爲勝，早有定論。當然汪氏僻居遠縣，難覓善本以資校助，脫漏衍訛，在所難

免。汪氏死後，書稿售與他人，幸被湯球發現，手錄以付其子錫蕃，才再次保存下來，然已有散失。光緒八年趙搗叔、林榮英代爲校勘印行，審核亦未精，復增舛譌。加上汪氏生前未能着手張瑩記佚文的整理，因此其功未畢，尙有補輯之必要。

作爲尾聲，清末江蘇吳縣人王仁俊，曾于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中（筆者用上海圖書館所藏稿本縮微卷），輯得華嶠、謝承、袁山松三書各一卷，實則華書一條，謝書、袁書各三條。又于經籍佚文中（同上書），輯有司馬彪書佚文一卷，計二條。其所據除稽瑞一書爲他輯所失輯外，主要錄自清杜文瀾之古謠諺，對姚輯雖有所補，然而具體引文均被汪、黃、孫、王（謨）四輯從原始材料採錄過。可見王仁俊見聞并不廣，輯佚手段也不甚高明。

在先師陳直先生的指點下，六年來我主要從事東漢史籍的整理工作。爲了使八家書佚文盡量無遺漏地匯集起來，也爲了給史學工作者提供更完備和更可靠的資料，筆者不揣淺陋，在前人已取得的重大成果基礎上，再作爬梳，重加整理，撰成本輯注，以就教于讀者。其中不當之處，切望專家及同行們批評指正。

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，曾得到西北大學張豈之、游欽賜、林劍鳴、戴南海、楊繩信諸位老師的關懷和幫助。南開大學的楊翼驥先生和來新夏先生，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吳樹平同志，都會爲筆者解難釋疑。又有北京圖書館的李致忠、薛殿璽及善本書室諸同志，上海圖書館的沈津同志，